

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合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编

内 部 资 料
合 江 县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十 一 辑

主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合江县委员会
编印：政协合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印刷：合江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9 印数：2000

时间：1992年10月 字数：97.5千 邮编：646200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1992）

¥15.00

目 录

一生奋斗的任崇高先生·····	廖士元 (2)
周官和传略·····	袁寿昌 (18)
周梅君传略·····	袁寿昌 (21)
回忆我的叔父穆济波·····	穆显德 (25)
卢剑波传·····	喻亨仁 (31)
怀念父亲赵欲樵·····	余柏林 (48)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	梁佐华 (55)
泸州越狱脱险记·····	孔祥钦 (105)
从艰难困苦中走来·····	徐君慧 (113)
解放前我在合江开辟工作的情况·····	吴宇同 (130)
翰墨生香晋颂歌	
——合江县诗书画院漫述·····	宋家惠 (138)
更正·····	(151)

一生奋斗的任崇高先生

廖士元

任崇高先生，字仰之，合江县燕坪乡人。1881年农历十月十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只租种了几斗土，父亲是垒子匠。他13岁开始读私塾，17岁辍学，在他的王干妈家帮助管帐，兼教蒙童。以后，在乡间教私塾。1909年，合江成立私塾改良会。他赞成私塾改良，在他的私塾里大力推行改良，除教授《四书》、《五经》外，积极向学生传授新知识。自己也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教法。1911年起，在家乡的官立初等小学堂任教员，先后参加上海师范讲习所、单级教授讲习社及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社初级班的函授学习，均毕业。同年5月，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全川掀起了保路运动。他对清政府强夺四川人民的筑路款，出卖筑路权给帝国主义，万分痛恨。他赞成哥老会的保路行动，在家乡参加了哥老会，帮助哥老会，并组织学生罢课，声援保路运动，自己也剪去辫子，决心反清。

辛亥革命后，在合江各小学任教，积极向学生灌输新思想。1916年，在县立西四区元通寺（今属新殿乡）国民学校任校长。护国之战时，他在新殿场大力宣传和谴责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当地封建头

面人物的不满。当时，新殿场新建了一座土地庙，请他给土地庙题写对联，他写的对联是“莫说是土偶木偶，须知能福人祸人”。横额是“当方土地”。因这付对联又影射了当地的封建头面人物，受到排挤，被免去校长职务。次年，他到县立西四区石笋山（今属尧坝乡）国民学校任教。临行前，学生为他饯行，依依惜别。他口占七言诗一首，作临别留念。诗文是“元通寺里官学校，东乡有人来施教。朝日讲读声琅琅，时越寒暑未离庙。今朝解职复何求，帐被箱笼一概收。来年此校良师至，智胜愚人几百筹”。因他平时教学认真，深受学生欢迎。元通寺学校的150多名学生中，竟有30余人随他转学到石笋山学校读书。他在石笋山继续传播新思想，揭露腐朽的封建制度，影响很大。除校内学生外，校外青年也多来向他请教。其中韩启楼、刘明炎两人与他交往最密切。他眼见当地团总、甲长为害人民，十分愤恨，特意写了两付对联，予以谴责。一联是“臭虫格蚤虱，团总甲长兵”。横额“吃人无厌”。一联是“执政诸公，豺公、狼公、饕餮公，居然大公，公理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借公图利己，团防总局，酒局、赌局、糊弄局，无非骗局，局中者甘，局外者苦，何时了局免害人”。横额“遗臭万年”。由韩启楼、刘明炎两人书写，秘密张贴于尧坝场街上。对联深刻地描绘了地方当权者的狰狞面目和压迫人民的罪恶。看见对联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而“执政诸公”，却痛恨万分。虽然怀疑是任先生作的对联，但又抓不着凭据，只得暗中设法将他挤走。

他离开石笋山学校，在先市场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任初

级部负责人。石笋山学校又有50多名学生随他转学到第三高小读书。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四川也以重庆、成都为中心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潮，游行示威，提出“不吃日本食品，不买日本货物，不乘日本轮船，不受日本人雇用”的四项誓约及收回旅顺、大连，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号召四川各地响应。他和当地进步人士赵子明共同筹划，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第三高小60多名学生，手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抵制日本仇货”等三角形的纸标语，由赵子明带领在先市场街上游行，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搜查烧毁了商店里从日本进口的白胡椒，砸坏了不少东洋瓷盆。驻先市场的西三区团总吴惠存闻讯，立即派团丁将游行学生赶回学校，并派团丁在校门口监视，不准学生走出校门。校内落后守旧的教员，也唆使一些学生阻挠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任先生是这次爱国反帝游行的发动者，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抗议学校反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愤然辞职，离开了第三高小。

1921年，在城区西门内县立模范国民学校任教员。他教学循循善诱，使学生易于接受，懂得情理。还常在课外给学生讲故事，进行教育。一次，他给学生讲“关云长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故事。讲完后指出，关云长这样讲“义气”，完全是错误的，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才对，使学生受到深刻教育。

1922年下期，在重庆江北模范小学任教，参加恽代英在江北刘家台组织的“读书会”。加入读书会的共二三十人，

他负责争取和团结进步中学生，反对军阀。在此之前，他曾读过恽代英翻译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并作过笔记，所以在重庆会见恽代英时特别亲切。恽代英在离渝去上海之前，介绍他与在省立二女师任教的肖楚女认识。不久，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他在重庆江北治平学校任教。该校有小学部和中学部，是无政府主义活动猖獗的地方。他和肖楚女组织“学行励进会”，利用开时事座谈会，争取学校师生，反对无政府主义。第三次时事座谈会时，肖楚女邀请张闻天给大家作报告，内容是反对西方哲学思想。他曾两次邀请肖楚女到治平学校给部份学生演讲。一次是讲“怎样读书”，一次是讲“怎样爱国”。11月9日，日本“德阳丸”轮船私运劣币，抗拒检查，打伤重庆谍查兵，激起民众义愤。他和肖楚女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宣传日本人的暴行。1925年正月初，肖楚女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宣传，谴责日本人打伤中国人的暴行；他在重庆南岸真武山趁民众朝山时，发表演说，斥责日本人的罪行。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7日，重庆成立“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他担任募捐委员会主任，募得数千元，救济上海及江巴的罢工工人。以后，他和肖楚女与治平学校师生一道参加抗议“英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的民众抬尸游行。治平学校的一位教员被捕，民众包围了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他和肖楚女均是这次游行的活动分子，已为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所注意，只得离开重庆。在离渝之前，他把由他照看的在治平小学读高年级的学生张泰荪（合江人）叫到身旁说：学期马上要结束了，我要到上海去，你要好好地读书，

多学一些救国救民的学问……并把第1期至52期的合订本《中国青年》送给张泰荪，希望好好阅读。

1925年暑期，他到了上海，在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刻写蜡纸和负责油印。此外，并在上海大学、江湾艺术大学、立达学园等地活动，征集中国济难会会员，先后共征集得会员数十人。10月的一天下午，他在北浙江路散发传单，于老垃圾桥头被捕，关在老闸捕房，直至深夜才被放出。1926年，在上海先后会见肖三、陆定一、任弼时、恽代英、肖楚女、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不久，恽代英派他到共青团中央工作，负责搜集报纸上刊登的民众革命活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以及新出版的杂志、书籍。有时，还协助校对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

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时，由任弼时撰写传单稿，他负责油印和运送。他机智勇敢地躲过敌人李宝率领的大刀队的搜查，把一大车传单顺利送到各地。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和肖三等人到闸北横滨路参加游行，被毕庶澄的军队围困了30几个小时，直至毕军被工人武装纠察队击败，才得以解围。以后，他和陆定一同志去汉口，在模范区青云里三号租了五间楼房，建立共青团机关。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汉口一片白色恐怖，反动军警四出抓捕革命者。他除掩护共青团机关外，并负责通讯联络。在陆定一同志全部撤离汉口后，他于11月6日晚乘日本“太渔丸”号轮船回上海。

当时的上海，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很难开展工作。1929年，他患了肺结核病，在宝隆医院住院治疗。1931年，李求

寒、恽代英等同志先后被敌人杀害，上海团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秦邦宪主持。他边调养病，边工作。秦邦宪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特别信任陈卓文、刘治躬二人。1933年正月初，陈卓文、刘治躬二人被捕，随即叛变。不久，刘治躬带领几个敌特人员将他捕去。在一家旅馆关押一天一夜后，送到上海公安局铁牢关押。端午节前夕，他和铁牢的同志发动全监狱的难友绝食，并由他发言，要求改善待遇。结果他被带上手铐，送到龙华司令部关押。7月，又铐送苏州警门监狱。这里是两个人关在一间牢房，无法进行活动。他常是终日静坐，几天不说一句话，直关押至1934年8月20日才被释放。

出狱后回到上海，应邓劫刚的要求，担任上海杨树浦临青坊临青小学的校长。该校是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创办的，白天是小学班学生上课，早晚给附近工厂的工人补习文化，教师多是四川人，校舍是租用一家美国公司的房子。在他担任校长之前，因无钱付款，已拖欠房租1000余元。1935年8月中旬的一天，美国公司请来巡捕和法院人员来查封学校，收回房舍。他发动民众反对美国公司封闭中国人的学校，巡捕也挨了打。结果他和一名民众被捕去在格兰路捕房关押了一昼夜，并限期迁走学校，退还美国公司的房舍。在民众的支持下，学校迁至附近的顺城里继续开办，以后并增设了中学班。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相继成立。他和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召开救亡座谈会，通过串连活动，决定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6年2月9日，在上海

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馆举行新年同乐会，会上公开宣布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他和沙千里、潘仰光、刘良模、李晓扶5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主持开会。会上选举15人为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主席团5名成员，均被选为理事。职业救国会的宗旨是：争取中华民族生存，不当亡国奴。

1936年3月初，各救国会决定联合举办纪念“三八”妇女节游行。他动员临青学校女教师和早晚参加补习文化的女工参加，自己也和中国青年会男会员一起参加游行，走在妇女队伍后面。游行队伍自公共租界中心地段出发，穿过法租界，最后进入华界。游行队伍虽然遭到公共租界巡捕的拦阻和法租界巡捕的殴打，但游行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社会影响很好。5月30日，他和临青学校教师一起到天后宫桥上海总商会参加纪念“五卅”惨案民众大会。会场内有800余人，会场外有2000余人，沈钧儒、史良、章乃器3人在主席台上，他也是主席团成员。开会时，混入场内的坏人散发汉奸言论的传单，会场内打了起来。他在主席台上大声招呼：不要再打了，再打，会就开不成了！史良也说：现在打的不是大汉奸，我们的力量要留下来打大汉奸。会场逐渐平静下来。会后游行，沿途加入游行队伍的民众很多，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游行队伍经过“五卅烈士墓”时，向烈士默哀致敬。

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陶行知提名，他当选为常务理事。20日，他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顾执中等研究决定，次日在火车北站开展抗日宣传，他作为职业界的代表参加主席团。第二天黎明时，

他和顾执中、刘良模及暨南大学一名女同学（也是主席团成员）来到北站。这时，站内外满是救国会会员，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不久，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车站。救国会会员随即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主席团赶忙找到指挥军警的警务处长，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救国会会员。警务处长要求救国会把秩序维护好，不要发生意外事故。经过纠察队的努力，秩序很快恢复。与此同时，临青学校教师李群夫（即李亚群，解放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向军警展开宣传，高喊“士兵同胞们、警察同胞们……”军警们听了，很多人把原来举起的枪变为持枪，有的军警还流下眼泪。下午约3点钟时散会，开始游行。沿途加入游行队伍的人很多，大约有几万人。游行队伍沿街书写和张贴抗日标语，直到天晚时才解散了。

9月下旬，英国巡捕到临青学校搜去四大捆进步书刊，他被格兰路捕房短时关押。10月1日下午，巡捕又到学校捕走刘、侯两位教师。此后，他隐避在刘树森医生家。11月2日，杨树浦的日本纱厂工人准备举行反日大罢工，希望得到救国会的支持。他带领日本纱厂5名女工代表到辣斐德路辣斐坊一号楼史良家中会见史良，以后又一同去会见沈钧儒。救国会决定全力支援工人的反日大罢工。3日晚上，杨树浦日本纱厂首先开始罢工，他和临青学校教师钟朗夫秘密协助工人成立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打狗队（打日本人的走狗），宣传处。接着，沪西日本纱厂也开始罢工，中国纱厂工人也罢工声援。救国会及时发来米票，救济罢工工人，支持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国民党上海当局强迫工人复工后，杨树浦日

本纱厂工人又带头再次罢工。自11月3日至22日，先后罢工3次，参加罢工的日本纱厂和中国纱厂共26家，工人4—5万多人。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逮捕，以迫使工人停止罢工。沈钧儒等人被捕后，关押在苏州监狱。他积极投入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的斗争，和顾留馨带领50名救国会会员到苏州，请求高等法院释放“七君子”。结果他们被关进苏州第三监狱8天。沈钧儒在狱中得知他们被关押后，写信给张一廉，由张一廉请律师敬树诚担保他们随传随到，才获得释放。1936年底回到上海，这时他很难在上海出面活动，住在法租界的李复石老中医家（后来才知道李家是党的秘密联络处）。党为了他的安全，要他去苏北阜宁盐业公司华成小学教了一学期。这段时间，他每月要秘密回上海到临青学校一二次。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14日，四川旅沪同乡会改组，他被选为理事，担任同乡会的组织部副部长兼战时服务团团长。当时前线的伤员急需救护，他立即组织战时服务团团员成立“四川救护队”。四川救护队队员的工作非常积极，不仅日夜救护伤员，而且还将民众捐赠的慰问品带到前线，慰问伤员。他自己也常亲赴前线参加救护工作。10月，100多个救护队评选时，四川救护队评为第二名。

他和临青学校教师钟朗夫在报上看到中华救济会有几个难民收容所要让出的消息。四川旅沪同乡会接受他和钟朗夫的建议，于8月24日将霞飞路恩派亚大戏院内的300多名难民接收过来，成立四川难民收容所，接纳四川籍的难民。由

同乡严镜余任所长，具体工作由钟朗夫带领战时服务团团员办理，该收容所于11月上旬结束。

日寇占领杨树浦一带后，他大力支持临青小学教师陈珩组织临青小学学生10人，陶行知的小先生4人和另外9名青年，组成剧团——即后来的孩子剧团。四川难民收容所首先欢迎剧团去演出打汉奸的歌剧，以后，各个难民收容所都欢迎剧团演出。上海沦陷前夕，孩子剧团撤到后方，在后方继续演出。

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前夕，他带领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的64名团员（内有部份人员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撤至南京，又由津浦路经徐州来到郑州。这时田拓夫想当团长，他和几个同乡商量后，便推选田拓夫任团长，李浩然（中共党员）负责宣传，他改任秘书，负责全团的生活事务。这时，钱早已用完，他将身上仅有的两毛钱用来买纸写标语，全体团员在当地展开抗日宣传。吃饭问题，由他向陇海铁路抗敌后援会借钱来解决。他们到驻郑州的川军127师营地宣传了3天，士兵抗日情绪激增，效果很好。师部要他们一同到前线去宣传抗日。其时，上海孩子剧团正在郑州陇海铁路花园公演。郑州车站存放有工人缝制的慰问前线的棉军装6000余套，车站知道他与孩子剧团的关系后，便赠与他们64套棉军装。1938年2月上旬，他们随127师乘火车东上，师长陈离约他会见，他向陈离提出战时服务团员希望配给枪弹的要求。陈离即拨给步枪40枝，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两箱。火车到临城停下，李浩然带领大部份团员到枣庄与工人组成游击队，田拓夫逃走，他带领少数团员继续上前线。后

来，127师在滕县被日寇包围，伤亡很重，陈离也负伤，得到工人游击队的掩护才冲了出来。此后，他辗转到达皖北。

1938年8月，他担任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总务部总干事。1939年元月，在安徽省阜阳县抗战中学任教导主任，校长是县长王和曾兼任。一些共产党员通过他的关系，安置在学校任教，皖北特委书记周季芳，便将特委机关秘密设于抗战中学校内。阜阳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举办训练班，要他去讲授“领袖言论”，他就选择于抗战有利的话强调讲解。如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抗战到底，才能生存。中途妥协，就是天亡”。孙中山的“必须唤起民众”等等。当局对他的讲授，虽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同年12月，国民党阜阳专员向省教育厅反映阜阳抗战中学有学生去参加新四军，他被撤职。此后，通过135师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共党员张哲海的活动，他到该师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支部队原是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被国民党阜阳专员控制后，改名135师。中共党组织希望把这支部队争取过来。他在该师工作到1940年5月，其活动被发觉，师部将他押送上级政治部处理。押送途中，他逃脱，并绕过敌人的封锁线，于7月下旬进入解放区安徽涡阳新四军驻地。受到新四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和淮北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

1940年8月，他担任豫皖苏边区抗日联合中学校长。12月，担任淮北行署副主任、怀远县长，仍兼任联中校长。1941年8月，行署创办淮北中学，由他担任校长直至1945年8日。该校是一所干部学校，为了便于同敌伪争夺青年，吸收青年入学，才以普通中学命名。学校认真贯彻解放区的“教

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方针，除教好文化课程外，重视学生思想教育，积极组织师生参加革命斗争。党政领导，定期给师生作时事政治报告。1943年春，陈毅、张云逸等经过淮北，也曾到校给师生作报告。师生经常参加中心工作，1941年秋和1942年夏，曾两次到各县参加征粮工作。1944年冬季，师生到各地协助开展冬学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学校积极响应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坚持开荒、种菜、种粮、编席、榨油、生豆芽。1943年行署主任刘瑞龙在“政权工作总结”中曾赞扬“淮北中学今年种菜最有成绩”。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巡逻警戒。1942年11月敌人对解放区进行了33天的大扫荡，师生紧急疏散，在敌人反复扫荡过程中，由于得到群众的掩护，1000多名师生无1人遭到意外。1944年春的“泗阳扫荡”和1945年1月的敌军进攻解放区，师生编成工作队，分散到各地参加反扫荡斗争。1945年8月日寇投降，敌人占据的城镇陆续得到解放。淮北中学师生奉区党委命令，编成工作队，奔赴各个新解放的城镇，承担接收和管理的工作。4年的时间里，淮北中学先后为淮北党政军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了2000多名干部，对巩固和发展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毛泽东主席提议迅速召开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当时豫皖苏边区已有600万人口，应选人民代表10名，他被选为人民代表。8月下旬，10名代表起程赴延安。行至途中，因日本投降后的情况变化，会议不再召开，

代表们遵照中央指示返回。

1948年元月，区党委和行署创办豫皖苏建国学院，以加快培养干部，适应解放战争的迫切需要，他担任院长。同年10月24日，第二次解放开封，学院派去大批学生参加开封市的接管工作。同时学院接收了河南大学的部份师生，全院学生人数达到1500余人，分设财经、文史、数理、农业、水利、测绘、俄语等系科；另附设公教人员训练班，招收学员300余人，短期培训后，就地分配工作。1949年2月，全院师生组成南下工作团，他任团长，与王昭铨等带队将1000余名师生送至六安县，交与张国华部和杨勇兵团。3月，又将其余师生送往合肥交与宋任穷的金陵支队，参加南京市的接管工作，建国学院至此结束。建国学院先后共培养了1800多名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担任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主任。他遵照柯庆施市长指示，亲自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拨来建校经费，分校先后培养了近万名的学员走上革命工作岗位。1950年12月后，他历任南京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监察厅副厅长。195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6月，任民革江苏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江苏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他勤奋好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和党的方针政策。在革命根据地时，他记了几十本亲手用毛边纸订的

学习笔记。进入城市的20多年的时间里，学习也都要记笔记。1940年11月3日，新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送给他一本193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的《马恩与马克思主义》。在淮北中学任校长时，他将此书存放在学校图书馆，供大家阅读。淮北中学结束后，他一直把书带在身边。他读过的《资本论》、马、恩、列选集和毛选，很多地方都有眉批。他不仅自己认真学，还买了许多“毛选”和“选读本”赠与周围的人学习。他学习能联系实际，“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激烈时，有一个认识他的人在路上拦住他不怀好意地问：“你有什么观点？”他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我的观点。”后来报纸上刊载了“促生产”。他在学习小组发言说：“……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立即有人反对他。他不急不忙地说：“这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篇文章里讲的。”反对他的人听了，只好哑口无言。

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革命根据地时，他的马经常让给病号和小通讯员骑。1987年《宿迁中学校志》中赞扬他1945年9月以后任淮北区立第二中学校长时“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以身作则”。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时，建国学院的全体炊事员感谢他平时的关心，送给他几块肥皂和一封信，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礼物。1950年他已年近70，组织上给他配了汽车。但他能不用车时就尽量不用，节省了不少汽油。1951年“三反”运动时，受到柯庆施市长的表扬。在根据地和初进入南京时发的津贴是华中银行发行的纸币，他很少使用，后来也未兑换。1956年工资改革后，他的工资是行